



李致忠

著

肩朴集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李致忠

肩朴集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肩朴集/李致忠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ISBN 7-5013-1488-8

I. 肩… II. 李…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图书馆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G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948 号

书 名 肩 朴 集

jian pu ji

著 者 李致忠 著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 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字 数 436(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5013-1488-8/G · 398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自序	(1)
----	-------

卷 一

试谈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5)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制字材料的演进	(13)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印考	(38)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	(53)
五代敦煌地区的出版家曹元忠和他的几件出版品	(75)
“自刻本”与和凝	(88)
“宰相出版家”——毋昭裔	(95)

卷 二

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易注疏》考辨	(100)
关于《文苑英华》	(110)
书林胜语	(126)
元大德本《梦溪笔谈》	(140)
《筹海图编》的作者与版本	(143)
清刻《龙藏》漫议	(151)
略谈《台湾府志》	(161)
略谈《水浒传》版本	(165)
永嘉函询论红楼	(169)

卷 三

辽代的北京刻书·····	(183)
金代的北京刻书·····	(195)
元代的北京刻书·····	(208)
明代的北京刻书·····	(221)
清代北京的內府刻书·····	(242)
清代北京的坊肆私宅团体刻书·····	(268)

卷 四

古书“旋风装”考辨·····	(280)
中国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287)
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	(309)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325)

卷 五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访书志·····	(342)
英伦阅书记·····	(358)
美国的东亚图书馆·····	(382)

卷 六

析津志与析津志辑佚·····	(392)
《金云翘传》整理后记·····	(404)

卷 七

略谈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入藏的善本书·····	(420)
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	(430)
图书馆的定额管理与目标管理·····	(438)
略论北京图书馆的目标管理·····	(452)

图书馆员的职业道德·····	(464)
略谈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477)
再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486)
提高公众图书馆意识 发挥各类图书馆作用	
——论国家图书馆与其它各类型图书馆·····	(499)
北京图书馆的历史沿革与历史定位·····	(512)
北图的古籍典藏与古籍整理·····	(528)
北图数据库建设的战略思考·····	(535)

自序

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
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尔翁啜九流。

这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己亥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这一年，龚自珍四十八岁，因为“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触动时忌；至是以闾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养归。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不携眷属，僦从，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贫自馁也。”^①这就是说，道光十九年（1839）的四月二十三日，因为种种原因，龚自珍弃官离开了北京。七月九日，到达故乡杭州。十月又回至河北任邱，遣一仆入都迎接眷属。“公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雄县；又请，又进次固安县。眷属于冬至后五日出都。”^②在由家乡又北上迎接京中眷属的途中，即己亥十月至十二月中旬，龚自珍连续接到其长子龚橙字昌匏的来函。龚自珍便以四首诗以答之。上边引述的这一首，就是他给儿子复函四诗中的第三首。

龚自珍，字璚人，号定盒，又名巩祚。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于杭州。道光二十一年（1842），也就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年仅五十而暴卒。他生活的这五十年，是乾嘉学术发展的五十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五十年。当鸦片战争炮声掀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史的辑封时，他便溘然长逝了。这五十年，他从科举仕途的旧营垒中走来，却从音韵训诂考据风气中跳出来，从讲究词藻和神韵的诗古文空洞中跃出来，以三百多篇散文和八百首诗词，慷慨

论天下事，以图有补于世道人心，变革图强。但饱经世态炎凉最后弃官离都之后，回首往事，细嚼人生，对儿子还是提出了胸无点墨，饿着肚子还要高谈阔论，我以此为忧。肯于担当有根有据靠训诂考证立说的朴实汉学，胜于拜官封侯。五经应熟读深悉得如同家常便饭，不要像你爹那样去广泛涉猎百家九流。

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儿宽，宽又授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自有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以宽问一篇’。”^③到清代，乃由顾炎武总结明代学术空泛而致亡的教训，开一代朴学之风。逮乾嘉，一方面实学继染，一方面文字狱余悸未消，故学人躲避政祸，钻进故纸堆，寻章摘句，从文字音韵训诂下手，注经考史，有如汉代经学，故称清代汉学，也称为朴学。可见朴学虽然离现实政治远了一点，但于学术却是求实寻真，颇为后人称许。

我本人出生在燕山脚下，自来土厚心实。后来在政府和人民的培养下，竟然能入学读书，且一气读完了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又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从事善本书的编目整理工作。善本书编目，从书名卷数、作者生平、著作方式，到版刻时地、版刻主人、版本优劣、版本源流，乃至装帧形式，原装改装、递藏流传、闲章雅印、批校题跋等，样样都要著录。所谓著录，实际则是编目者对某一书情况向世人表示学术态度。这个态度要表得准确和正确，背后就得有大量的认真的考证。这种工作性质，虽不完全同于清代的朴学，但又不外于清代朴学的一脉，更不外于清代朴学的流风。自己性格朴实，工作又得天天去考实，久而久之便成了风格习惯——“肯肩朴学”。

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学术的走廊，不是当官的通道，晋爵的阶梯。在这里工作，只能当社会的配角，甘为人梯，安贫乐道。但也有优越之处，那就是用书方便，考证有源。人一旦能够在这个知识

海洋里游刃，就会乐此忘返。什么升官晋爵、封侯拜相全都不在思绪之中了。这岂不是龚自珍“肯肩朴学胜封侯”的企望吗！自知这种引喻颇有自吹自擂抬高自己之嫌，但自己多年来却默默地效仿着、自励着、缓慢地前进着。今天当着某些文字要能结集出版时，便大胆地引喻此诗，给这本集子命名为《肩朴集》。这可能会给学林提供个笑柄，为世人留下点谈资。

我本人几十年来的研究大体是三个方向、一个职业。三个方向一个是版本目录学，一个是中国书史，一个是古籍整理。一个职业就是图书馆工作。由于工作职业的关系，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也大体围绕工作职业而展开。属于版本目录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也曾单篇发表过，但在我过去出版的专著中已经收了进去，在此不应重行收录。现在收进本集的谈版本的文章，多是就某一书的版本考定，虽然具体而微，但多是有所为而发，版本考定上多有深化和推进，对以后也许还有参考价值。这是一类文章。算是肩朴的一块内容。

书史研究是我多年留意并锲而不舍的课题，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学界也首肯其说。出版《中国古代书籍史》和《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时虽也有所吸收，但都是正面阐述，无法反映考证的全貌。此次将先后发表过的论述书史上某些问题的文章，编成了一组，收进了此集。算是肩朴的另一块内容。

版本学研究，就大背景而言似乎应挂靠在出版史上。近些年来，各地在修志过程中，作为专志之一的出版志，也都在编写出版中。我出生在燕山脚下，是北京大地的儿子。北京在中国出版史上有过什么业绩，占据什么位置，是经常萦绕心田的史事。故有辽、金、元、明、清北京刻书的系列文章先后发表。这是一组文章，收进集子留下来也可能还会有些用处。中国是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研究版本不研究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其特点，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故在多年的探索中对印刷术、出版家等内容也有所接触。只是由于文献不足征，实物缺明证，所以迄今尚

无明确的发明年分定论。我的那几篇考证性的文章，作了某些探讨，以期引起讨论。

古籍整理，诸如校点辑佚等，也是我多年努力的方向。每整理出版一部古籍，总要有一篇整理说明。这些说明无须都选，但《析津志辑佚》和《金元翘传》两篇说明，牵涉的学术面较宽，资料也较丰富，故选了进来，尚有用处。

图书馆工作是我毕生从事的职业，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工作的管理，对员工的职业道德等，我都倾注心血，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些论述。每篇虽论及一题，但也还会产生一些长时效应，故作为心路历程的记录，也将它们收入了此集。这些虽算不上是肩朴，尚可属于求实。

当今平常人别说出版集子，就是很有价值的专著，只要专业较窄，征订无几，出版社赔钱，均难版行于世。我是一般人，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张彦博、总编辑曹鹤龙诸君，竟然不惜赔赚，慨然承出我个人集子，使我十分感动。这里除了他们的魄力，我想还有友谊。除了友谊，他们还心怀图书馆事业。他们实质上是代表图书馆对一个老馆员表达厚爱，为图书馆的来者留下一份情份。所以在我诚心感谢他们的同时，还应向这些为北图深谋远虑的智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当然还会有责任编辑刘卓英的精心编审，出版者马兆放的精心设计和下厂操劳，以及发行者的惨淡经销。对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付出心力的同志，我都表示诚挚的谢意。

①② 197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196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所附《定盦先生年谱》

③ 《汉书·儒林传》卷八十八

卷 一

试谈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明

谈到印刷术，不论是雕板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这一点早已为世界所公认。其中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由于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翔实记载，也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唯雕板印刷术，它究竟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却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结论。

从古代到近代现代，中外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学者，不下数十人。他们当中有些意见除了因根据不足未免主观臆测而不能成立外，还有一些意见就是以现存实物为证据而下结论。如，自从清光绪间敦煌出现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王玠雕印普施的《金刚经》以后，一些近代现代学者便以此为例，从而推断雕板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唐代中晚期。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实物健在，论证凿凿。但只要对这幅雕板印刷品进一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超越了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混淆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这种说法把已经相当成熟的雕板印刷技术视为刚刚发生；第二这种说法把雕板印刷技术的发明同把这种技术应用于成套的印书混为一谈。这就等于说雕板印刷术没有发生、发展的自然过程，而突然就出现了像唐印本《金刚经》这样雕印技术造诣很高的印刷品了。

众所周知，唐懿宗咸通九年王玠雕印普施的《金刚经》是一部

首尾完整的卷子。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十六尺，完整无缺。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在给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扉画。^①妙相庄严，栩栩传神。构图复杂，雕镂精湛。完全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板印刷品。试想，如果不是在此以前雕板印刷术就已发明，并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怎么可能突然就会出现如此娴熟的雕印技术和如此成熟的印刷品呢？因此，唐印本《金刚经》不是雕板印刷术发明的证据，而是这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的象征。

我个人认为，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和将这种技术应用于印刷书籍，应该是这一技术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发明是发展的前驱，发展是发明的进化。如果不分阶段地把两者混淆起来，把印书之始看成就是印刷术的发明，那就无异于把影印书籍之始误认为就是摄影技术的发明了。其实这是既有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阶段。弄清楚这些道理，再谈雕板印刷术的发明，问题可能就比较解决好解决一些。

人类社会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发明总是同当时的社会需要，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相适应，并且总是从简到繁，从粗糙到精细。遵循事物发展的这种客观法则，探讨我国历史上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我个人赞同“东汉发明说”。即雕板印刷术在我国东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后半叶），已经产生。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朝人郑机。他在其《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借驳斥雕板印刷术五代发明说，提出“汉刊章捕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但他这种说法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也就长期沉埋无闻。一九五八年，张秀民同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其中列举了此说。但由于张先生并不同意此种观点，所以只用几句话就给否定了。我个人觉得，郑氏之说虽然论据还不够充足，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现就郑机所提出的《后汉书》中的根据，扩展开来，谈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

《后汉书·党锢传》载：“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又载：“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並，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这桩党锢事件发生在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说的是山阳张俭，因反对大宦官中常侍候览和卑弃同乡小人朱並，而遭到朱並的诬告和汉灵帝的刊章讨捕。

这段记载是否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能否作为雕板印刷术发明的证据提出来，关键在对“刊章”二字作如何解释。最早为“刊章”二字作注的要推唐章怀太子李贤。他说：“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他的意思是说，汉灵帝不想把诬告张俭的朱並泄露出去，因而连朱並上告张俭的章表也削除毁掉，而直接逮捕张俭等。其次为“刊章”二字作注的是元朝王幼学。他在《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中说：“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他的意思是说，汉灵帝收到朱並以党祸诬告张俭的章表以后，认为张俭践踏了他的汉家法，犯了图危社稷的弥天大罪，于是立即下令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火速讨捕。而这种刊印的公文，王幼学认为就像元朝时通缉犯人的板榜。一件事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需要辨明谁是谁非，才能确定“刊章”二字的确切含义，才能确定其是否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有关。

首先李贤的解释是由于死硬地直训“刊”字的字义而导出来的。其实“刊”、“刻”互训汉代已有多例。清乾隆三十九年三通馆编辑《金石略》，关西王元氏曾上了一通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的《祀三公山碑》。碑的内容说的是常山相莒西冯君到元氏县就职时，遇到该地连遭羌寇和蝗旱之灾。后有道叟指点，祈祀三公，于是甘露屡降，国界大丰，报如景响。于是“长史鲁国颜校，五官阎祐……等刊石记焉”。又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阳城长吕常所造《嵩山太室石阙铭》中有“……以颂功德，刻石记文，垂显口口，以传后贤”。此处的“刊石记焉”与“刻石记文”当是同一个意思，

“刊”、“刻”二字完全是可以互训的，“刊”字并不一定非要解释成“削”义。并且，如果说在“党锢传”中“刊章讨捕”，李贤的解释尚能勉强说通的话，那么到了“孔融传”中就难以解释了。《后汉书·孔融传》在记述这段历史事实时说：“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候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这里显然是说中常侍候览利用汉灵帝年纪尚小，自己擅权，口衔天宪，假公济私，一手承办了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颁行州郡，指名讨捕张俭。显而易见，这里的“刊章”如果仍作“削章”解，那么“下州郡”就没有着落了，也解释不通了。《三国志·蜀志》记载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为诸葛亮之死，后主刘禅单有个诏策说：“……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照将来，刊载不朽。”这显然是后主刘禅对诸葛亮“功德”的嘉惠，说他的事迹将永垂青史，刊载不断。这里的“刊”也只能是“刻”的意思。如果还当“削”解，那“削载”连属就自相矛盾不成文义了。上述几例说明“刊”、“刻”互训，在汉灵帝“刊章捕俭”前后已有多例。不错，“刊”是有“削”的含义。但“刊章”连用，“章”是否就一定是削除的对象，从上述《孔融传》的提法看，未必如此。

可是李贤硬把“刊章”直接解成削毁章表，是很难自圆其说，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皇帝捕人，无须削毁上告人的章表。汉灵帝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的海捕公文，也无须一定要宣露朱並的大名。看来还是元朝王幼学的解释较好，文义通达，符合情理。东汉的党祸是宦官与外戚斗争的发展与扩大，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集中表现。这个斗争直接关系到皇帝统治的安危。远在山阳的张俭等图谋结党，对于皇帝和宦官来讲当然是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地要讨捕问罪的。这种政治上急需而雕印比较简单的海捕公文，州郡张贴或通知州郡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且后世对“刊章”的运用也常是如此的含义。清朝初年郑方坤为钱谦益作传，对钱氏被捕曾有过如此描写：“已而当轴者修前隙，必欲置之死地。复罗织前科场事以奏，刊章急征，银铛被体，身填牢

户，命如悬丝。”^②近人章士钊在批何焯（字义门）不解柳宗元文章深旨时曾说：“惟义门处康，乾暴政之下，刊章密布，文网迭兴。”^③这里的“刊章急征”与“刊章密布”都说的是刊印的捕人的榜文。足见王幼学“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的说法，是符合古合今的，是正确的。这样，汉灵帝“刊章捕俭等”似乎就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有关了，就可以作为雕板印刷术发明在东汉后期的证据提出来了。当然雕板印刷术的发明也决不是没有任何条件地孤立地就能产生出来，还需要考察其它有关的条件，在东汉时是否已经具备，才能进一步论证这种说法能否确立。

首先看纸的发明。纸的发明与发展是印刷术发明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纸的发明和应用，也就无所谓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发明造纸术比发明印刷术要早得多。一九五七年西安霸桥西汉早期墓中（约在汉武以前，即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前）出土了一块用纸包裹的铜镜，这种纸据专家们化验，系麻纸。这是至今所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用植物纤维造的纸。一九三三年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西汉宣帝刘询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的纸，据专家们分析也是麻纸。《东观汉记·蔡伦传》称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造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过去人们多根据上述记载，说造纸术是蔡伦的发明。事实上蔡伦之前早已有纸。蔡伦“典作尚方”，系管理皇家和朝廷的机关事务，改进造纸方法是其职责所在，并非发明。“自是莫不从用”倒是事实。

由此看来，早在汉灵帝“刊章捕俭等”以前三百年就有了霸桥纸；前二百年又有了新疆罗布淖尔纸；前六十五年即东汉和帝刘肇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蔡伦又改进了造纸方法，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有人曾说“造纸术的发明直接影响着印刷术的发明”。在发明

造纸术三百年后,在改进造纸术六十五年后,出现像汉灵帝“刊章捕俭等”这类需要急,文字少,规模小,州郡通缉的海捕公文这样的印刷品,完全是有条件的,也完全是可能的。

其次看墨的出现。人造墨的出现传说始于黄帝之时。也有说田真造墨的,又有说周宣王时邢夷作墨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案花纹已有很多是用墨描绘的。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也都是用墨书写的。可见先秦已有了人造墨。汉代宫中已有专门掌管纸,笔、墨、封泥的官员。做官的每月可以得到谿麋大墨、小墨各一枚。郑众曾说“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曹子建诗亦说“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可见在汉灵帝“刊章捕俭等”以前很早人造墨就已出现。这也是在东汉后期出现小规模印刷品的先决条件之一。

最后看在技术上与雕板印刷术直接相关的钹印。钹印就是图章,也称戳子或手戳。我国钹印技术出现很早,现存的集古印谱所记录下来的先秦古印,尤其是秦汉古印为数还很不少。这说明在秦汉时期钹印已很风行,至少在官员中已普遍应用。当然,钹印并不都是刻的,其中不少是用母范铸成的。这种铸印的方法在技术上未必能给雕板技术提供什么直接的启示。但在古代钹印中,不论是石、骨或金属的,确实有一大部分是刻成的,而且刻的是阳纹印鉴,这种刻制的阳纹印鉴倒确实是与雕板技术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五年日本人在朝鲜发掘汉墓,于柩中发现过一方木质印,上面刻有“五官掾王盱印”数字。^④同时出土的有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六十九年)年款的漆盘一个。证明此墓遗物当是永平十二年以前制做的。这方木印为研究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因为木质印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母范铸造的,而只能用刀镌刻。这种刀刻木质印的技术与雕板技术相比,除了在字数多寡和规模大小上尚有一些区别外,就雕刻技术而言,大概是毫无二致了。清道光年间李元复在其《常谈丛录》中说:“书籍自雕镌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借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

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⑤正说明古代雕鏤符玺与后来的雕板印刷技术在技术上是相通的,是可以给雕板印刷技术以更直接的启示的。由此看来,一百年后的汉灵帝为讨捕张俭而刊刻雕印了海捕公文,就技术上讲也并不是什么突如其来,而是有较长时间的技术准备的。

总之,有汉灵帝要火速讨捕张俭等人的政治需要;有造纸术在此以前的发明和纸的进一步应用;有墨的广泛使用;又有铍印鏤刻技术的直接启示;有“刊章捕俭”的证据,因此,说雕板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公元二世纪的中叶,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有人也曾经这样提出过问题,即如果在东汉就已发明雕板印刷术,那么为什么从东汉到唐代四五百年间,仍然是大量的抄本书传世,而既不见文献记载,也不见片纸雕板印刷品留存呢?这种问题提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如何解释才能把这四五百年间印刷术的断弦空白说清楚,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这里不妨做一些推测,提出来供参考。

某种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的。社会安定、经济允许、人们需要,是任何技术发明与发展的前提。雕板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这些必要的条件。但是自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已日趋动荡。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朝代更替不迭,战乱连年不休。经济凋敝,文化萎顿。根本不具备这种与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技术继续发展的前提。隋朝虽完成了统一的大业,但其历史短暂,来去匆匆。似也不具备发展这种技术的条件。只有到了唐朝,国家进一步得到统一,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都有了实际发展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雕板印刷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并出现像《金刚经》那样成熟的印刷品,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至今未见唐以前有印刷品流传下来,一是可能根本没有;